

共时性学科理论视野中平行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晏 红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重庆 400031)

摘 要:一百多年来,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历经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中国学派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学科理论都有其历史决定性因素以及历时性的局限。在共时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视野中,平行研究经过跨文明研究的实践洗礼,在文学跨越学、文学关系学、文学变异学和总体文学学的理论建构中,呈现出更具开放性、发展性与世界性胸怀的特征,从而实现从美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到整体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突破与飞跃,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学术借鉴。

关键词:共时性;学科理论;平行研究;方法论反思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22)04-0087-05
收稿日期:2022-02-20

作者简介:晏红(1965-),男,重庆长寿人,文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

DOI:10.15991/j.cnki.411028.2022.04.022

长期以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讨大多处于历时性的三阶段学派理论建构之中,这种理论模式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一百多年来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面貌,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历时性的理论建构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对比较文学研究所具有的共时性特征造成一定的遮蔽。对此,当今学界已经有所反思。马工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在谈及其编写的指导思想时就明确强调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充分考察每个阶段学科理论的历史性决定因素基础上,既肯定比较文学发展不同阶段之间存在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又认识到其历时性的局限。^①其实,早在 2005 年,曹顺庆先生就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共时性角度对三个阶段的学科理论进行了整合,以“跨越性”和“文学性”为基础,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分为四个方面,即“文学跨越学”“文学关系学”“文学变异学”和“总体文学学”,从而使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讨跨上了一个新台阶。^②

通过共时性的学科理论整合,比较文学诞生之初拥有的开放性、发展性和世界性特征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回归。而且在这种共时性学科理论中,传统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以及跨文明研究必然会开启一种新的研究视野,焕发出新的学术价值。基于此,

本文拟以共时性学科理论视野中平行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为研究视角,突破作为美国学派学科理论的历时性局限,探讨平行研究在共时性视野中具有的科学理论价值,从而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学术借鉴。

一、平行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众所周知,平行研究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美国学派的兴起得以确立的,其具体定义就是雷马克所说的:“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③究其实质便是立足于文学性基础上跨国与跨学科的“平行研究”,其世界性胸怀在诞生之初尚未

① 《比较文学概论》编写组:《比较文学概论》(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第 11 页。

②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0 页。

③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张隆溪编选:《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1 页。

真正显现。另外,基于美国学派兴起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可以说平行研究的确立是以“文学性”对法国学派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事实性”的挑战,是“类同性”和“综合性”对“同源性”的纠偏,因此平行研究与法国学派的学科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形成一种固步自封的困境。平行研究所具有的学科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并未得到完全阐释与真正运用。

随着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全面复兴,平行研究的学科理论传入中国,且影响巨大。不过,学界大多将平行研究视为美国学派的一种研究方法,虽然肯定其“对影响研究在理论上的突破,在实践上的发展”^①,但只是道出其方法论指向,并不能充分揭示平行研究所蕴含的方法论精神内涵。同时,因为对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把握不准确,也常常导致“比附文学”的出现。如何消除这种现象并避免平行研究的浮泛化,使其契合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质,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此,有学者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功能与模式”视角出发,将平行研究的理论功能与具体研究模式结合起来进行了新的思考。^②应该说,这种功能与模式的探讨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理解,而且也将促进平行研究方法在具体实践中的改良与进步,从而尽可能避免“比附文学”现象的出现。但是,这种思考仍局限于具体方法的运用,不能完全体现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所拥有的胸怀和基本精神。若从共时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视野出发,将平行研究上升到方法论层面,我们会发现平行研究具有一种超越具体研究方法并与比较文学的胸怀和基本精神相一致的方法论意义,不仅贯穿比较文学的发展始终,还是维系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基础与支柱。

二、平行研究与文学跨越学

在比较文学一百多年的发展中,“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安身立命的根基,文学跨越学以此为基础,既继承了历时性学科理论中对跨越性研究的强调,又在新的理论建构中将跨国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整合为一个整体,从而突破了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局限,使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得到了新的发展。^③

在文学跨越学视野中,曾经长期困扰于历时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些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的阐释。比如,对一贯被视为平行研究范畴的“主题学”反思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一般而言,在历时性的学

科理论视野中,主题学被视为平行研究中的独特学科,但是在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中,对主题学的探讨会涉及处理具体学科源流的问题,而这必然会使主题学研究包含影响研究的内容。因此,当我们在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学科范畴中对主题学进行定义时,主题学归属的复杂性就呈现出来了,正如曹顺庆先生所言:“它不是简单的影响研究或者平行研究所能容纳的。”^④考察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学科理论可知,一方面,因为主题学研究涉及对某个主题或者母题追根溯源的探讨,而这必然与影响研究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在美国学派的学科理论视野中,主题学则强调没有影响关系的主题的平行研究,这就与法国学派迥然不同。这个问题在以三个学派为代表的三阶段历时性学科理论中难以两全,而在共时性学科理论视野中,不但可以并存,而且相得益彰。

文学跨越学的理论立足点是“跨越性”,因此要准确把握文学跨越学,必须真正理解比较文学的跨越性特征。虽然学界对跨越性的基本属性特征已达成共识,但在具体理解方面仍存在争论。尽管跨越性可以体现为跨国家、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跨文明等,但却是以跨国家、跨民族、跨语言三位一体为基础的。简言之,只有同时具有跨国家、跨民族、跨语言的跨越性,比较文学研究才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这种跨越性还必须与文学性构成一个整体,即便是在跨学科的平行研究中,也应该以文学性为基础,否则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就会流于泛滥。对此,美国学派的代表学者雷马克特别强调:“文学和文学以外的一个领域的比较,只有是系统性的时候,只有在把文学以外的领域作为确实独立连贯的学科来加以研究的时候,才能算是比较文学。”^⑤这里的“系统性”固然有对文学以外领域的学科性的强调,但更多是对跨学科研究中文学性的确立。在此意义上,跨越性与文学性不仅使文学跨越学有了根基,还使平行研究有了作为比较文学方法论的坚实学理基础。

随着美国学派的崛起,跨学科研究作为平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发展。尽管雷马克为跨学科

① 孟昭毅编著:《比较文学通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

② 王向远:《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功能模式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③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0—42页。

④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⑤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6页。

研究确立了文学性基础,但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依然引起比较文学界的争议,比如威斯坦因认为文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不属于比较文学。不过,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文学与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并作为精神生产要素参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对此不仅不能回避,还应该以特有的平行研究方法介入其中,在充分继承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理论的基础上,融入当今学界学科交叉研究的理论成果,使平行研究在新的研究视野和学术语境中发扬光大,焕发更大的学术意义。正如乐黛云先生所言:“由于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越来越深刻的影响,……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与文学研究之间的整合和互动必将为比较文学的发展翻开新的一页。”^①

显然,在文学跨越学的视野中,跨学科研究的繁荣必然会拓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视野与空间,同时也推动比较文学研究与与时俱进,不仅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回应当今语境中的学术问题,还在更高层面上向开放性、发展性和世界性特征回归。

三、平行研究与文学关系学

在曹顺庆先生提出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范式中,文学关系学是在跨文明视野中对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新发展。曹先生指出:“纵向的国别文学史和横向的国际文学关系史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学发展的网状结构。比较文学的文学关系史研究的一个任务就是从这个角度入手,力求走出以前单一的纵向的单一国家文学史,而以世界性的开阔眼光来描述这种文学发展的纵横结合在一起的网状结构,这就构成了一种文学发展的状态学的研究范畴。同时,文学的网状发展模式也给我们重新定位和了解文学发展的动力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学发展除了国别文学史中所提供的纵向的继承和创新的动力外,还应该具有横向的发展动力。文学关系学研究的对象中就包括了对文学横向发展动力的探讨,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互相交流、对话、融会也是形成文学新质发展的主要诱因之一。”^②在这里,文学关系学的确立一方面依然肯定不同国家文学之间实证性关系的影响意义,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向国与国之间在文学交流、对话与融会过程中文学新质的形成与发展必然存在的种种变异,而这就突破了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历史局限性,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视野。

一般而言,人类文学发展网状结构的形成虽然离不开纵向的国别文学史,但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横向的国际文学关系史,而最能体现这种研究的当

属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这也是后来法国学派直接将比较文学定义为“国际文学关系史”的根本原因。^③不过,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发展,基于实证的文学关系史研究已经不能有效阐释文学交流中出现的复杂问题,因此文学关系学虽然立足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但却以一种开放的理论姿态充分承纳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从而呈现出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不一样的学术特征。简言之,“影响研究”并不能完成文学关系学视野中“文学关系史研究”所要求的全部任务,平行研究在这个研究领域亦有其用武之地。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明确指出:“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个别处衍生出来的原始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在文学方面,这种因果解释,几乎不能完全成功地确立任何因果关系所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即当X发生时,Y必然发生。”^④在当语境中,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与文学交流越来越频繁,交流与相互影响的方式也越来越复杂多样,呈现出多渠道、立体式、快速性等特征,文学发展的网状结构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丰富多彩。如果只用传统的影响研究进行探讨,不仅会有极大的局限性,还会对这种文学发展的网状结构形成一定程度的遮蔽,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说:“真正的影响研究,大约只能是在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非常贫乏的情况下才存在。……而二十世纪是个信息越来越密集的时代,人们可以通过许多渠道来了解外来影响,特别是当许多‘外来影响’因素完全融入了本国的日常生活,你根本就无法去辨认它的渠道。”^⑤因此,基于自身文学研究实践,陈思和先生明确提出对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探讨,这种观点不但体现出研究者对于影响研究在当语境中处理中外文学关系时局限性的清醒认知,而且隐含着文学关系史研究中应具有的文学性审美眼光

① 乐黛云:《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

②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28页。

③ 基亚著,颜保译:《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页。

④ 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25页。

⑤ 陈思和:《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1期。

和世界性胸怀,而这必然会导向平行研究。换言之,文学关系学不仅要关注实证性影响的文学关系的研究,还应思考在文学发展中纵横结合的网状结构里蕴含的基于自身历史文化语境及文学主体的差异性体现出的文学性追求,而这个问题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无法解决的。所以平行研究的介入势所必然,而且还会以一种开放性、发展性和世界性的胸怀尽可能吸纳各种学术研究成果,从而把比较文学研究导向丰富多彩并有效回应人类文学发展网状结构在当今语境中出现的种种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

四、平行研究与文学变异学

基于在文学发展中纵横结合的网状结构里形成的文学关系的复杂性,韦勒克在大半个世纪前指出的上述问题在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不仅没得到有效处理,还在当今语境中变得更为突出。对此,曹顺庆先生提出了与“文学关系学”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范畴,即“文学变异学”。曹先生认为:“我们视野中的文学关系学研究要强调它的实证性。不过,……一直被人所质疑的所谓影响研究中存在美学价值因素和不确定性,将被我们归入文学变异学的研究范畴中。”^①文学变异学的提出及相关理论的建构,不仅是中国学者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独创性理论贡献,也使平行研究在此理论视野中拥有了新的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概念是曹顺庆先生2005年在《比较文学学》中提出的,不过对其进行确切定义和理论阐释的则是他在2006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曹先生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②在此学科理论中,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同源性”和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类同性”转为跨文明视野中的“异质性”与“变异性”。体现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差异性与文学性便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立足点与精神指向。具体而言,差异性一方面指向影响研究里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种种变异,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平行研究相互阐释中存在的因文化及语境不同而出现的变异。这样,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不仅突破了其在历时性学科理论中的历史局限性,还在新的理论视野里丰富了其对比较文学研究所具有的方法论指导意

义。文学性则立足于文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基础,将比较文学真正还原到文学作为人学的意义原点,使比较文学研究在跨越异质文明之墙的同时,也体现出研究者作为主体在阐释相关理论及文学作品时必然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与思考。

通过辨析可以发现,平行研究在文学变异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即探讨文学变异中那些无法依靠实证性研究获得有效阐释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存在于同质文化圈内的各国文学之间,在跨东西方异质文化之间的各国文学中也尤为突出。在美国学派时期,因为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局限性,平行研究并不关注比较文学的异质性,因此就不得不面对当比较文学研究涉及异质文明时所带来的困惑与危机,由此也引发了美国比较文学界内部的争论。对此,曹顺庆先生认为:“学者们彼此间相互对立的观点恰恰说明他们看到了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危机,即异质文明之间究竟可比不可比的问题,却没有解释清楚这种可比与不可比的真正深层次原因。”而要解释这种深层次原因,必然会涉及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因为在跨越性的文学阐释中,研究者会因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及个人主体性的不同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异,“例如,在用西方理论阐发中国文学作品时,两个完全不同的异质作品对象在阐发的视野交汇处产生了阐释变异因子。不同文明的异质性导致了不同文明在阐释与碰撞中必然会产生变异,而这种变异就体现在双方的阐释交汇处,这也正是平行研究的最根本之处。”^③

可以说,在文学变异学视野中,平行研究彻底突破了美国学派以求同思维为核心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以求异的方法论精神指向成为跨文明比较研究的坚实理论支撑,焕发出全新的学术意义。

五、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学

总体文学的思想起源于歌德以及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学”的设想。当今比较文学界关于“世界文学”并未达成一致的认识与评价,大概有三种观点:一是指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的总和;二是指超越各民族和各个时代之上的具有普遍价值的世界经典文学作品;三是指世界各民族文学融为一体的文学理

①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② 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复旦学报》,2006年第1期。

③ 《比较文学概论》编写组:《比较文学概论》(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29页。

想。如果就“世界文学”这个术语而言,上述三种观点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均言之成理。不过因为这个术语是歌德提出的,而他提出时的特定语境以及后来比较文学的发展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则赋予它在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特有的意义:“一是对于各国各民族文学的一种世界性胸怀,二是一种已经存在的、但又未曾完成的民族文学间的交往过程。”^①

在一百多年来的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梵·第根是较早对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关系进行论述的比较文学理论家。为了确立比较文学独立的学科地位,梵·第根将文学研究分为国别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总体文学研究三个不同层次。在他看来,国别文学研究探讨一国文学之内的问题,比较文学研究关注两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而总体文学研究则负责多个国家文学所共有的事实。三者相互区分,也相互联系。^②他的观点有合理性,也有不当之处。其实,在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总体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进一步拓展,二者虽各有其意义指向,但并不是截然两分,而是密切相关。为了进一步探讨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之间的关系,曹顺庆先生在跨文明研究的理论框架中提出了“总体文学学”,试图重新对其进行学科定位。结合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实践,曹先生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切入总体文学学的研究:一是从比较诗学到一般诗学的研究;二是对文学人类学和总体文学的研究”^③。在这种理论构想中,平行研究在总体文学学的视野里拥有了新的方法论意义。

自艾金伯勒提出比较文学将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④的论断之后,比较诗学的研究便日新月异蓬勃地发展起来,尤其是跨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诗学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刘若愚、叶维廉、孟尔康、曹顺庆、刘小枫、饶芃子、杨乃乔、张法、余虹等都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而在此之前,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者和代表人物,如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等,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和重点集中在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比较诗学关注的是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在美学沉思上的异同,并且试图以此为基础建构起能够涵盖和阐释所

有文学现象的“一般诗学”,这显然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理论构想和学术场域。而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正是实现一般诗学这一学术理想的首要方法论,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平行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更显示出日益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意义。

在共时性学科理论视野中,总体文学学研究的第二个层面是“文学人类学”。之所以将文学人类学视为总体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与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属性密切相关。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学人类学既有人类学的学术立场与研究方法论,又有文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一方面,重视对文学整体性特征及深层结构的概括;另一方面,又注意在以族群为单位的前提下,通过多元比较,努力把握由想象和虚构等表达行为所体现的人类整体性,而这就暗合了从‘国别文学’到‘比较文学’再到‘世界文学’的逻辑推进”^⑤。

在此意义上,既然文学人类学最终的指向是通过对各民族—国家文学,尤其是神话传说的分析、阐释与比较来揭示文学的整体功能与结构,并指向人类的整体性,那么文学人类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在总体文学学的视野中便达成同一,平行研究自然也就成为文学人类学必须依赖与运用的方法论。

总体而言,在共时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视野中,平行研究经过跨文明研究的实践洗礼,必将拥有更具开放性、发展性与世界性胸怀的特征,从而实现从具体的美国学派的研究方法到整个比较文学方法论的突破与飞跃。

①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2—114页。

② 梵·第根著,戴望舒译:《比较文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06—212页。

③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④ 艾金伯勒:《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16页。

⑤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责任编辑 张先飞)

Solving Paradox: On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Ancient Prose and Ci-fu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Fang Bao "Forbidden Fu" in Ancient Prose

Wang Sihao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ancient prose and Ci-fu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reative practices in the Ancient prose movement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ang Bao credited with his article is somewhere between Han Yu and Ou Yangxiu, but he forbade the use of Fu in ancient prose. Fang Bao imitated Li-sao 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emotion in his Ci fu, which was believed to come from Han Yu and Liu Zongyuan. Fang Bao found a writing paradigm to express his true feelings in the world of Ci-fu. Later scholars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pursued Yangxiong through Han Yu, and incorporated the magnificent words and the style of writing into the ancient prose. Therefor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nstructing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literature tradition, they solve the paradox by changing. These scholars advocated the study of articles,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view of miscellaneous literature to the view of pure literature, and also in pursuit of the purity of articles.

On Naturalism in Henry Lawson's Writing

Zhang Jiasheng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ist writer Henry Lawson produced many classic works based on harsh bush environment with his pessimist views, which indicates his naturalist thought.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naturalist thought in Lawson's prose works from three aspects: indifferent bush environment, "human beast" image, and tragic fate. The article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environment, human instincts,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bushmen are doomed to end in madness or tragic death. To survive the dark and tragic living environment, bushmen uphold the spiritual flag of "mate-ship", but all failed. The naturalist thought in Lawson's works is undoubtedly the product of bush reality and his pessimism views towards the bush, the society and the world.

Research on The Naming Legitimacy and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 Plains Screenwriters Group

Yan Jun

The name of The Central Plains Screenwriters Group is derived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Writers Group, but there are objective differences with the latter on personnel composition. The independent characteristic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and the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s of The Central Plains Screenwriters Group in the field of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have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for the legitimacy of its independent naming. Due to the similarity of growth experience and the commonality of cultural genes,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scripts created by The Central Plains Screenwriters Group reflect distinctive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content; they focus on the three major themes of rural areas, military affairs, and history, and they are expert at depicting the optimistic and tenacious character of the Central Plains people in the narrative of suffering. The Central Plains Screenwriters Group generally chooses the realistic method based on real life and pursuing objective reappearance, and rejects the deformation and alienation of life by non-realistic methods.

Plant Prose Writing in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Zhang Wei

Plants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human's daily life. Plant pro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rose, but there is littl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plant prose. Plant prose is rich in materials, often seize the uniqu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life character of each plant to express the beauty of different forms of plants, as well as the heart throb and feeling of viewers. Plant prose is mainly based on things, Emotions are connected with plants, an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plant images and human emotions, deep and moving emotions between the author and others, hometown, country and nation are presented. Plant prose always investigate the things and extend to the knowledge, stimulating human rational consciousness, life consciousness and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way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eternal life theory contained in plants.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in plant prose, such as narrow pattern, similar idea and stereotyped creation method. Only by fearing life, loving nature and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the life, the world can prose writing advance to a new stag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on Parallel Study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Synchronic Disciplines

Yan Ho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with a history of over one hundred year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French school, American school and Chinese school. During the process, theories in each period have been decided and limited by historical factors and diachronic context. On the contrary, from the synchronic perspective of th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parallel study accords with the practice of cross civilization research, which is much more open-minded, cosmopolitan minded and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in constructing the academic framework of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theory, the literary relationship theory, the literary variation theory and the general literature theory.